

俄蘇文學通觀

ESUWENXUE TONGGUAN

吳俊忠 著

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

俄苏文学通观

吴俊忠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俄苏文学通观

吴俊忠 著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轻工业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625 字数：160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定价：3.80元

ISBN 7—81022—365—8 /I·040

目 录

第一部分

- 关于加强俄国文学教学的文化理论色彩的思考…… (1)
- 论俄国自然派小说的形象体系…… (12)
-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及围绕它的争论…… (72)
- 艺术追求与思想探索
- 从“屠格涅夫现象”到“肖洛霍夫现象”…… (85)
- 俄国文学通观…… (95)

第二部分

- 试论《苦难的历程》在苏联小说史上的地位及意义…(109)
- 更新文学研究方法的有效尝试
- 读《叶赛宁研究论文集》……(120)
- 苏联社会变迁与苏联当代文学……(127)
- 细读方知其中味 联想更觉意蕴深
- 评阿·伊宁的《纪念日》……(141)
- 附：《纪念日》……(145)
- 爱情的绝唱 道德的颂歌
- 读阿·伊凡诺夫的《阿尔卡的歌》……(149)
- 附：《阿尔卡的歌》……(158)
- 简述艺术直觉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186)
- 苏联当代作家西蒙诺夫简介……(195)
- 苏联侦探小说家谢苗诺夫简介……(198)
- 后 记……(203)

关于加强俄国文学教学的文化理论色彩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借鉴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成果的进程，我国的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有了较大的变革和创新。教研工作的视野更开阔了，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增强了文化意识，调动了文化的审视力，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但相比之下，外国文学中俄苏文学的教学研究不如英美德法等国别文学的教学研究来得活跃，教学内容中相对定论和约定俗成的比较多，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诚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俄苏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大多是从社会政治发展变化的角度来进行观照，而从文化学角度进行多层次分析的则比较少。表现在教学方面，相当一部分是沿用以往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很少有新意。学生不爱听，老师自己也感到兴味不浓。鉴此，改进俄苏文学教学，加强俄苏文学教学的文化理论色彩，已势在必行。

笔者在俄苏文学的教学实践中体会到：加强俄苏文学教学的文化理论色彩，重点是在俄国文学方面。苏联文学和苏联当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俄国文学的传统，在文化意义上，与俄国文学具有很大的连贯性。此外，70多年来，苏联社会经历了多次深刻的变革，许多问题还有待于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进一步地观察和思考，既不宜过早结论，也不宜刻意创新。因此，本文着重就改进俄国文学教学谈一些粗浅意见，以期得到专家们的批评和指正。

一、关于俄国文学传统的思考

俄国文学在短短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出现了群星灿烂、佳作连篇的繁荣景象。对于俄国文学发展的原因，迄今为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社会动荡说”或“社会变革说”，即认为俄国社会的动荡和变革，促使艺术家、思想家们用文学的形式说出自己的观点，探讨“谁之罪”、“怎么办”的问题，因而导致了俄国文学的繁荣。与此相联系，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俄国文学的传统亦在于文学直接干预社会生活，和俄国的革命解放运动息息相关。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基本符合俄国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无疑是正确的。缺陷在于，对俄国文学传统的阐述，只停留在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这一层次上，而对于俄国文学的深层文化内涵则阐述不够，因而容易使人们对俄国文学传统产生误解或片面理解，似乎俄国文学传统就体现在文学的社会性，即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上。笔者认为，俄国文学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些文化内涵的长期积淀，成为俄国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悲剧意识

俄国文学就总体来说，是革命的文学，觉醒的文学。俄国作家们用进步的思想观照俄国社会现实和各类人物的行为方式，在文化考察中审视社会，在民族苦难中产生强烈的使命感，为国家振兴和社会进步忧思反省，因而所写的作品具有比较浓厚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使俄国文学成为“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的文学”，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历史影响，成为俄国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纵观俄国一些著名作家的创作，我们看到，他们的文学悲剧意识是多层次的，既有表层的生活悲剧，也有深层的心灵悲

剧，集中表现在各类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下面以小人物形象和妇女形象为例，来进行具体阐述。

“小人物”形象是俄国文学的一类系列人物形象，从普希金到契诃夫，俄国作家对“小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既反映他们悲惨的生活遭遇，又揭示他们心灵的重负和人性的扭曲，显示出更深层次的悲剧意识。无论是小人物的忍欺受辱、认命不争的软弱，还是曲意逢迎、虚伪奸诈的卑劣，或者是愤而抗争、命运难改的怨哀，都体现了作家对小人物哀其不幸，叹其无能，怒其不争的思想情绪，表现出作家对人生悲剧和社会悲剧的深层思考，进而让读者从这一系列的悲剧中感受到俄国社会的腐败和民族的危机，激发人们“重整乾坤”、完善人性的愿望和激情。

妇女形象是俄国文学中独放异彩的人物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光彩恰恰在于人物形象的悲剧命运的深沉内涵。无论是普希金笔下的达吉亚娜（《叶甫盖尼·奥涅金》），还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妇女形象众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分析，这里仅以两人为例），其形象意义和思想内涵均在于她们的悲剧命运给人的启迪和思考，即“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了给人看”。

达吉亚娜的悲剧是女性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自身命运的悲剧。她的悲哀不仅在于她的初恋之情受到冷遇后，她违心地嫁给一个老头，葬送了自己的青春，而且更在于她“熟练地扮演贵妇人的角色”，她对奥涅金的那一番充满道德训教意味的开导，与其说是奥涅金的悲哀，不如说是她自身的悲哀。不管作者的主观意图怎样，我们感受到的达吉亚娜是一个在人生征途上始终不知如何把握自身命运的可悲的女性，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思索。

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是女性命运抗争者的悲剧。她在把握自身命运方面似乎比达吉亚娜高出一筹。她不能漠视僵死的婚

姻，具有追求自由、追求爱情的勇气，力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她对爱情的认识是肤浅的，追求爱情的行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她作为第二性的女人，虽奋力抗争，仍未能摆脱作为男人玩物的命运，取得真正的人格独立。她“戴着镣铐跳舞”，最终粉身碎骨。她的悲剧引起人们对妇女解放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深层思考。

上述可见，无论是“小人物”形象的悲剧，还是妇女形象的悲剧，都是作家“忧患出文学”的形象体现，显示出作家融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于一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同时也表现出俄国作家通过人物的悲剧命运来观照社会、审视人生的美学理想，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广阔的认识俄国社会的文化视野。

2. 忏悔意识

俄国文学是批判色彩较浓的文学，其中有对社会的批判，也有对社会各阶层的人的批判，这种批判从文化学意义上说，包含着作者对国家、对民族以及对自身所属阶级的解剖和反省，体现出强烈的忏悔意识。人们从这种忏悔意识中，可以感悟到文化的弱点、民族的弱点、人性的弱点。

俄国文学的忏悔意识是多层次的交汇和重合，有宗教的忏悔，人性的忏悔，也有历史的忏悔，阶级的忏悔。首先，俄国作家笔下的“多余人”形象系列，是忏悔意识比较集中的体现。高尔基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中，把“多余人”形象的思想内涵称之为“贵族阶级的自我批评”，这是他对多余人形象所体现的忏悔意识的另一种形象而又鲜明的表述。剖析众多的“多余人”形象，我们感到这类形象所体现的是人性忏悔和历史忏悔的融合。从人性忏悔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奥涅金的碌碌无为，毕巧林的玩世不恭，还是罗亭的夸夸其谈，和丘尔卡图林（《多余人日记》）的自怨自艾，或者是奥勃洛摩夫的萎靡不振，都体现出“多余人”在盲目的追求和软弱的反抗过程中，无视他人，无视德行，以丑为美，平庸求生的卑劣人性，

这种人性的忏悔反映出贵族作家对本阶级的佼佼者“恨铁不成钢”的遗憾和惋惜，表现出贵族阶级的先进分子希望通过忏悔，克服人性弱点，力争有所作为的内在愿望，从历史忏悔的角度来看，“多余人”是俄国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时代主角，集中体现了一代贵族青年的思想特征和精神风貌，实质上是贵族作家为了其本阶级的利益，选择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把自身放进去，进行一种历史性的忏悔，试图探索曾作为时代主角的贵族青年为什么由兴到衰、一事无成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这里有“江河日下，一代英雄何处寻”的感怀和哀叹，也有“雄风何在，时代主角当振奋”的希望和期待。

其次，托尔斯泰笔下的“忏悔贵族”的形象，是忏悔意识的直接而又突出的体现。与“多余人”形象不同的是，“忏悔贵族”体现的忏悔意识是人性忏悔、宗教忏悔和阶级忏悔的交汇和重合。“忏悔贵族”聂赫留朵夫（《复活》）的反省和伸冤活动，从表面上看，是对人性的双重性中“兽性人”那一面所造成的恶果，进行深刻的道德反省和严厉的良心审判，力求用自身的良心力量战胜自身的“恶”，进行道德的自我净化。从深层来看，他的忏悔又注入了阶级、社会的内容，体现出托尔斯泰对道德沦丧、罪孽深重的贵族阶级的认识与批判。而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奔走伸冤之后，皈依宗教，在宗教教义中找到自己良心平静、道德净化的途径和归宿的结局，又给忏悔意识涂上了一层宗教色彩，力图从宗教的角度找出消除人间罪恶，净化人的灵魂，克服人性弱点的道路，这样，忏悔既是人性复活后的反省，又是阶级自觉意识的批判，同时也是有罪之人的赎罪，从而对人性善恶的歌颂与批判，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本质的认识与思考，以及对宗教文化的宣扬，有机地交融在一起，使忏悔意识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3. 批判意识

俄国文学的批判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悲剧意识和忏

悔意识的凝聚，是作家的文化自觉意识的集中体现，因此，这里所说的批判，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批判，而且是更深层的文化批判，既有对被扭曲的人性的剖析，也有对贵族阶级的阶级劣根性的揭示，还有对宗教虚伪的揭露，一句话，这是一种全方位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批判，实质是通过艺术的形式把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进行全面的清扫和审判，同时剖析这些社会文化基因对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其它一切生活的消极影响，使我们既可以看到俄国社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又可以感受到俄国进步作家渴望国家繁荣、民族振兴的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批判中渗透着激励，激励中又包含着批判，批判意识使文学在更新、更深意义上与社会贴紧在一起。

以上阐述的悲剧意识，忏悔意识与批判意识作为俄国文学传统的重要因素，综合、融汇在一起，形成了俄国文学传统的结晶，即既为人生，又为社会，在人生中见社会，在社会中见人生的优良文学传统。这种对俄国文学传统的“两为”表述，全面体现了“文学是人学”的本质特征，避免了文学与社会关系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使我们对俄国文学的认识，可以进入一个更深广的境界。此外，我们从苏联文学和苏联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中也看到，他们所承继的俄国文学传统，正是文学既为人生又为社会的集中表现，肖洛霍夫、艾特玛托夫等著名作家的创作，就是十分鲜明的例证。

二、关于俄国作家的艺术特色的思考

俄国作家群星灿烂，各有千秋，要科学地概述他们的艺术特色，具有较大的难度。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感到，长期以来，各类俄国文学史教科书和有关理论著作的作者，实际上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俄国作家的艺术个性进行了一定的概述，并且这些概述有的已经约定俗成，成为相对固定的概念被人们所接受。

但若仔细分析一下这些概述，从文化学意义上来看，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更深层的文化思考。

笔者认为，作家的艺术特色的形成，既有社会和时代的大文化背景，也有作家个人的小文化背景，倘若忽视了小文化背景，即忽视了对作家的家庭、阅历、素养、趣味、个性、气质及世界观的研究，就不能科学准确地把握作家的艺术个性。俄国文学中的“小人物”形象系列，“多余人”形象系列，新人形象，妇女形象，源于不同的时代，出自不同的作家之手，但在形象的本质特征上有很大的相似性，这是因为这些作家同处于“俄国文化”这个大文化背景上，但每个形象的思想深度，内涵侧重，则又体现了塑造该形象的作家个人的“小文化背景”。这是大家所比较容易接受的观点。由此我们感到，对以往关于作家艺术特色的概述，若从文化学的角度深入思考，必然会有更全面、更深刻的阐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例如，果戈理的创作被称为是“含有幽默意味的讽刺和抒情的相结合”，“是含泪的笑”。若考虑到果戈理的“小文化背景”，我们至少还可以深入到这样一层：果戈理的幽默讽刺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对喜剧的爱好，与他早年扮演讽刺喜剧主角的文化体验有关；而他的作品的抒情性，则与他的爱国热情和他对“真正的民族性”（即俄罗斯的民族精神）的深刻体验有关，至于他的讽刺的深刻和含泪的苦涩，又与他的不幸的人生经历和他对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的行为的深切痛恨密切相关。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誉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三大高峰之一，他的艺术特色被概括为“着重于人物内在本性的精神状态的矛盾变化的精雕细镂，而把性格形成的社会环境置于次要的地位”。诚然，这一概括是比较全面和准确的。但若回答“这一特色是怎样形成的？”这一类的问题时，就必须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起码可表述这样几点：1. 在艺术观念上，陀氏认为“艺术是人的美的永恒的探索”，主张在人的身上

探索人……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2.在艺术手法上，陀氏主张“从分析而不是从综合入手”，要“在分析每个原子的时候，……找到了整体”；3.在艺术追求上，陀氏决心毕生进行人生意义的探索，并在哲学、文学、生活这三者的思考中走上创作道路；4.在思想特征方面，他既有人道主义思想又有浓厚的神秘主义思想和宗教思想，思想既辩证又矛盾；5.在现实主义发展道路方面，他是从拉伯雷、塞万提斯、斯丹达尔那儿延伸而来，对社会心理小说兴趣盎然；6.在继承文学传统方面，陀氏继承和深化了先辈作家在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对各阶级代表人物个性发展和自我认识的社会心理分析的传统；7.在创作方法上，他奉行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幻想现实主义”；8.在艺术原则方面，陀氏宁可损害严整的艺术美和和谐，也要掌握其时代的“活生生的现实”中的“混乱”现象；9.在对人性的理解上，他的观点前后不一，摇摆不定；10.在性格特征和生理特征方面，他既善良又孤僻，癫痫病长期缠绕着他；又如被誉为“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的契诃夫，他的艺术特色被概括为“善于在描写凡人琐事的过程中运用细微的心理分析，把讽刺和抒情结合起来”（参见《苏联百科全书》），这一概括就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创作来说是比较客观和准确的。若再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进行系统分析，我们就可对形成这一特色的原因有更深刻的认识。首先，这与契诃夫的艺术观念和美学理想密切相关。他曾明确谈到：“人们要求作家应该有男女英雄和舞台效果，可是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也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讲聪明话，做得最多的倒是吃喝、勾引女人、说蠢话，必须把这些表现在舞台上才对，这并不是作家要这样写，而是生活中客观存在。”“舞台上的事情必须与生活一样复杂、简单。”这表明，契诃夫主张艺术要反映生活真实，反对描写两个极端，要通过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来展示生活的本质特征和人性的深刻内涵。

其次，表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是被恩格斯誉为欧洲文学的新流派的“小说革命”在俄国的反响；此外，冷静、客观地采用幽默、讽刺的笔调描写，同时又不乏抒情，既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果戈理等作家开创的俄国文学传统，同时又是他的不平凡的生活经历所郁结起来的内在情感的自然抒发，其中有对俄国社会文化的反思，也有对自身文化心态的外在调适。

三、关于俄国文学发展原因的思考

俄国文学的迅速发展，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一个比较奇特的文学现象。对于发展原因，我们在前面已谈到，大多数人认为，由于俄国文学与俄国解放运动密切结合，成为俄国社会动荡和社会变革的艺术观照，因而加速了自身的发展。我们认为，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从文化学的角度系统地来看，是不够全面，不够深刻的。在这一方面，波兰学者汤姆逊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汤姆逊认为，俄国文化中存在着所谓“圣愚传统”，其基本内涵是：对社会和人的认识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现象，否定和依恋，热情和冷漠，崇敬和嘲讽，温顺和强横，追求和拒绝，常常矛盾地统一在一起，形成所谓“文化悖论”。这种圣愚传统对俄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具体表现是，

“俄国知识分子的理想是实实在在地贯穿了圣愚法规的。俄国典型人格和俄国人的自我认识都是这种影响的进一步发展的证据。”俄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单一追求，温顺、热情和发出激情的能力，都具有‘阴影’般的一套相应否定性特征。”鉴此，汤姆逊认为，以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为作家主体的“俄国文学具有圣愚法规的明显痕迹。从民间故事到长篇小说，俄国文学都在其主角，甚至结构中包容了圣愚现象的辩证法”。仔细剖析和体会汤姆逊的观点，我们感到，这一观点作为对俄国文学的概括，不无偏颇和失当之处，但对于我们分

析、研究俄国文学，却具有一定的启发。由此，我联想到，俄国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俄国贵族阶级先进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群体反省”的艺术反映，其中既有对社会、对阶级的反省，也有对自身的反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圣愚传统的“文化悖论”精神，从文学现象来看，无论是“多余人”形象、“小人物”形象，还是新人形象、妇女形象，都是赞颂与批判、先进与缺陷的矛盾综合体。文学形象的矛盾，实质是作家思想矛盾的反映。俄国作家在专制、落后的俄国社会中，既有反传统的文化更新意识，追求新的社会理想，促进和期待社会成员的反思和完善，又不能根本摆脱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不能跳出阶级局限和文化局限的圈子，也正因为此，他们笔下的“多余人”形象是“既非乌鸦，又非孔雀”，“小人物”形象是既可怜又可恶，妇女形象是既可爱又可悲，新人形象是既可敬又不可亲。至此，我们可进一步认识到：俄国文学既是动荡不定的俄国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同时也是俄国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文化反思的艺术反映。从后一层意义上说，社会动荡是俄国知识分子反思的外在条件和“催化剂”，而圣愚传统的“文化悖论”精神，则是他们反思的内在基因和文化参照。这种反思从根本上体现了俄国文学“既为社会又为人生”的传统，也是导致俄国文学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值得提出的是，我们强调俄国文学发展的文化反思因素，并不否定俄国社会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文学的繁荣发展，相反，我们还想从社会文化的深层意义上，进一步探讨这一层因素。英国学者亨利·吉福德在论述托尔斯泰时谈到：“工业革命以及由它引起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方面的变革是可以用做衡量社会进步的宏观历史尺度的。把托尔斯泰放到这个背景上，它的悲剧性立即便可呈现出来（甚至我们也可以从这方面探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出现空前繁荣局面的原因）”。撇开这段话论述托尔斯泰的特定意义，就探讨俄罗斯文学发展原因

来看，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的变革，在19世纪的俄国集中表现为对现存国家政体和社会制度的思考，对各阶层人的社会地位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思考，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政治意识，社会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更新，因而必将出现激烈的文化冲突。谁之罪？怎么办？这一类问题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文化冲突的具体显现。俄国社会的动荡不定，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生活方面，同时也体现在社会文化观念方面，而且后者更为强烈，更是文学作品要突出表现的内容。俄国作家及时、敏感地把握住社会文化观念变革的脉搏，并艺术地反映这种变革。由此才产生了贵族公子与流浪者为伍（《茨冈》）、贵夫人“红杏出墙”（《安娜·卡列尼娜》）、贵族地主提倡与农民平等的艺术构思，给读者一个“俄国社会一切都翻了个过，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印象。而这一系列的艺术构思所产生的各类文学形象，实际上是在批判旧的社会思想和社会规范的时候，创造新的习惯、道德和思想方式，为社会构成新的规范和榜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国作家不仅反映俄国社会文化观念的变革，而且以自己的艺术活动参与和推动这种变革，从而成为导致俄国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文学是文化之华，是文化开出来的花朵，我们既要研究文学如何反映生活，同时也要研究文学如何通过作家的创造性心灵去折射生活，如何体现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中国文学的教学研究应该如此，外国文学的教学研究也应该如此。这样，我们才能从文学的启迪通向文化的归宿，使文学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普遍受益的艺术。这就是笔者写作本文的主旨和目的。

(1991.6)

论俄国自然派小说的形象体系

概 要

自然派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流派，对自然派缺乏宏观的总体研究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俄苏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文采用系统分析和历史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研究自然派小说的形象体系入手，力求较好地揭示自然派小说创作的客观艺术规律。

本文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形象体系的成因。从俄国文学传统的影响，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的影响，以及西欧文学的影响这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了形象体系形成的原因。第二部分：形象体系的社会内容。说明形象体系是由穷人和“小人物”、地主、农民、妇女、“多余人”、平民知识分子、官僚资产者这七大类数十个形象组成的多侧面、多层次的立体系统结构，它丰富和扩展了俄国小说的形象画廊，生动、具体地反映了俄国的社会结构，以及由这种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多种社会人物关系，对俄国农奴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展示了俄国社会的发展趋势。第三部分：形象体系的艺术创新及其对俄国小说发展的影响。首先从共性特征和个性特征这两个方面分别论述了形象体系所体现的自然派在形象塑造的类型深度与方法上的艺术创新，并从自然派的现实主义的层次，自然派作家的文艺美学观的异同等方面论述了形成共性特

征和个性特征的原因，以及共性特征与个性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接着，从宏观和微观这两个不同层次论述了形象体系的艺术创新对后来俄国小说发展的影响，并具体说明，宏观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作家本身的中后期创作的影响，以及对五六十年代乃至以后俄国小说创作的影响这两个方面；微观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比手法、抒情笔调和幻想手法等具体的艺术手法在后来俄国小说创作中的广泛运用。

本文的简短结论是：自然派小说的形象体系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在俄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然派通过这一艺术体系，继承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确立了批判现实主义在俄国小说创作中的地位，奠定了四十年代以后俄国小说的发展方向。

自然派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流派。长期以来，苏联的专家、学者一直比较重视对自然派的研究。苏联六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俄国文学史》都把自然派列为专章或专节进行重点介绍。此外，还有不少研究自然派的专著和论文（如库列绍夫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自然派》等等）。相比之下，我国对自然派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研究者大多注重自然派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的单一研究，而对自然派进行宏观的总体研究则还很不够，迄今为止，尚无论述自然派的专著问世，论文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因此，加强对自然派的宏观总体研究，较全面地揭示自然派创作的内部和外部规律，确立自然派在俄国小说史乃至整个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摆在广大外国文学工作者，尤其是俄苏文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自然派的创作有小说、诗歌，也有戏剧，而以小说为其主要创作体裁。前人对自然派的研究大多也是从小说入手。高尔